



核心阅读

当前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如果依然延续零和博弈的思维，将海外投资仅仅作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必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和发展了古丝绸之路沉淀下来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黄金原则，探索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一带一路”倡议 引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新发展

□ 尤 苗

金融危机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乏力

金融危机后全球范围内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速明显下降，2009—2013年的五年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年均增长率仅为0.26%，而金融危机前五年的年均增长率高达25.3%。近五年来，随着金融危机的影响日益减弱，全球对外投资直接投资规模有所恢复，2015年发达国家对外直接投资增长最快，增速为33%，达到1.1万亿美元，但2016年和201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速又有所放缓。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的最新预测，2018年全球对外投资规模将增加到185万亿美元，即使这样，仍低于2007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规模。此外，跨国公司作为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载体，近年来虽然海外分公司的国际生产活动仍在扩张，但增速却在放缓。2016年全球跨国公司的海外分公司的销售额和附加值分别增长了42%和3.6%，都低于近五年来的平均增长率。总体来说，受全球经济增长动力不足以及各国经济政策的不确定性、地缘政治等因素的影响，全球对外投资规模虽然有所恢复，但尚未达到金融危机前的历史峰值。

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乏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金融危机之后

发达国家集中精力恢复本国经济，并掀起了“再工业化”浪潮，对外投资的意愿和能力都有所下降。此外，发达国家还纷纷出台了吸引资金和利润回流的各种经济政策，比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希望通过税收改革实现制造业回流，重振美国经济。实际上，通过调整税收政策来影响对外直接投资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二战之后，美国为了扩展海外利益，巩固美国霸权，就曾出台过税法政策，并规定美国跨国公司的国外和国内收入都将被征税，但当母公司收入通过子公司进行经营时，只有当国外收入所得返回国内时才进行征税。此外，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原材料委员会为了解决美国当时原材料短缺的问题，也曾建议修改美国税法鼓励跨国公司在海外矿产和石油行业进行投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些经济政策的调整促使二战后美国跨国公司迅猛发展，成为全球跨国公司的代名词。

对外投资政策的“公共政策”理论也认为，各国经济政策的变化比如税收减免、税收延迟或者转移定价等政策都会对本国跨国公司的对外直接投资产生重要影响。历史不会简单重复自己，但总会押着相同的韵脚。2017年美国特朗普减税政策从另一个方面诠释了母国税收政策对跨国公司的影响。此次特朗普减税在于刺激“美国跨国公司的海外利润回流”，希望利用税收政策

的变化吸引跨国公司回到美国本土投资，最终带动国内投资和就业，提高本国居民收入。这种经济政策调整的背后其实体现了跨国公司对外投资和国家利益的互动关系。虽然两次美国税收改革的方向不同，前者是鼓励美国公司海外扩展，后者是吸引本国公司资金回流，但只是在不同历史时期跨国公司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方式不同而已，本质上都是“美国第一”原则的体现。在这种零和博弈的指导思想上，金融危机过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倾向于选择吸引资本回流优先恢复本国经济，结果必然使得全球对外直接投资增长的动力不足。

“一带一路”倡议引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

当前世界进入了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如果依然延续零和博弈的思维，将海外投资仅仅作作为维护国家利益的工具，必将不利于全球经济的复苏。正如世界经济论坛主席克劳斯·施瓦布表示，世界正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变化，在这关键转折点，需要有担当有领导力的新模式来应对世界面临的新挑战。在此历史背景下，中国提出了“一带一路”倡议，继承和发展了古丝绸之路沉淀下来的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为核心的丝路精神，以共商共建共享为黄

金原则，探索出一条合作共赢的对外直接投资方式。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2016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增长44%，达到183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使中国首次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中国跨国公司也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仅以2017年为例，我国企业共对“一带一路”沿线的59个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436亿美元，较上年提升了35个百分点，主要投向新加坡、马来西亚、老挝、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越南、俄罗斯、阿联酋和柬埔寨等国家。与此同时，中国跨国公司海外并购发展迅猛，2017年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实施并购62起，投资额88亿美元，同比增长32.5%。在当前全球保护主义和国家主义盛行的背景下，中国已经成为当前全球对外投资的重要引擎，对全球经济恢复起到关键作用。

更重要的是，相比于历史上英国将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作为维护海外利益的工具，美国将以跨国公司为主体的海外投资作为其霸权稳定的战略部署，“一带一路”倡议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则是打破了历史循环，在投资理念和投资实践上都有自己的创新。

在理念上，“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对外直接投资秉承共商、共建、共赢的投资理念，倡导“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目的是通过对外

投资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推动国际秩序向互利共赢、融合受益发展。这是我国对全球经济合作的重要贡献，为促进全球共同繁荣，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中国智慧。

在实践中，我国在对外投资中，不仅实现跨国公司自身的发展，还重视解决当地就业和民生问题，关注当地经济和社会的协调发展，以实际行动践行了“一带一路”愿景所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理念。2014—2016年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累计超过500亿美元，中国企业已经在20多个国家建设56个经贸合作区，为有关国家创造近11亿美元税收和18万个就业岗位。中国提出的共商共建共享新投资理念，不仅有利于推动中国自身发展，而且有利于沿路沿线国家实现共同发展，对世界经济复苏、稳定和繁荣也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跨国公司的发展

跨国公司是对外直接投资的主体，“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打破了零和博弈的思维，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忽视中国跨国公司的经济主体目标，特别是当前我国跨国公司走出去的主体依旧以国企为主。相反，“一带一路”倡议下倡

美国缘何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 崔守军 刘祚黎

2017年12月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承诺将美国驻以大使馆从特拉维夫迁往耶路撒冷，打破了美国延续了近70年的外交传统。耶路撒冷是亚伯拉罕诸教的“圣城”，也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三圣城”，在巴以及阿以关系中承载着极为重要的宗教意义。特朗普此举兑现了自己的竞选承诺，但触及到了巴以和谈的焦点问题，意味着巴以关系的正常化进程将更加复杂，引发国际社会的普遍忧虑。

特朗普政府的意图

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是中东和平问题的核心，而耶路撒冷则是巴以和谈中最敏感、最重要、分歧最大的议题之一。在1967年“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占领包括东耶路撒冷在内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并宣布整个耶路撒冷为以色列“永久、不可分割的首都”。巴勒斯坦人则坚称东耶路撒冷是未来独立的巴勒斯坦国首都，认为以色列占领耶城的行为非法、无效。鉴于国际社会的压力，美国虽然在1995年就通过“耶路撒冷使馆法案”，但迟迟未启动迁馆进程。此次特朗普的迁馆决定并非空穴来风，而是具有对内政外交上的双重意图。

在内政上，特朗普意在巩固执政地位，备战中期选举。特朗普在总统竞选阶段得到了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等犹太财团的大力资助，上台后兑现承诺，希冀犹太财团能够投桃报李，在2018年中期选举乃至2020年总统大选中给予更大支持。2018年中期选举的意义非同一般，其结果不但会影响到特朗普的政治权威，还会重塑未来多年的政治格局。目前共和党掌握着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占据优势地位。由于受到建制派

精英的制约，特朗普执政一年来政令不顺，挫折不断。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想继续在国会推进提案，就必须设法保住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对于急于翻身的民主党人而言，只有重新夺回国会中的多数席位，才能推出有利于本党的提案。此外，在迁馆决策中，福音派基督教组织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部分团体虽然人数较少，但政治话语权很大，确保白人福音派成员的支持有利于巩固特朗普的执政地位。

在外交上，旨在提高美国重塑中东格局的影响力，强化“美国优先”的政策信条。此外，由于俄罗斯对叙利亚问题的强力回归，使叙利亚局势向着有利于俄罗斯的方向发展。在耶城问题上制造分歧，把水搅浑，有利于牵制俄罗斯，增大美国的外交话语权。

对中东局势的影响

耶路撒冷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既直接关系到巴以关系问题，又影响到中东地区的和平与稳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宣誓使巴以和谈的前景暗淡，对地区格局的走向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首先，加剧了地区的紧张局势。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以“两国方案”解决巴以冲突，即依据1967年边界建立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巴以相互承认和平共存。特朗普的这一决定，浇灭了巴勒斯坦将东耶路撒冷作为首都的梦想，助长了以色列国内的右翼政治势力。对巴勒斯坦来说，耶路撒冷具有深刻的宗教意涵，美国承认耶城是以色列的首都，意味着以方对这座城市及穆斯林圣址的控制力会不断强化，而未来巴勒斯坦即便成功建国也难以对东耶路撒冷行使管辖权。对以色列而言，右翼利库德集团的强硬主义路线得到正

向激励，内塔尼亚胡政府会继续秉持“以安全换和平”的主张，未来继续扩大犹太定居点，强化对占领土地的实际控制。

其次，加大了伊斯兰世界的裂痕。“阿拉伯之春”以来，阿拉伯世界由于内部矛盾的加大而呈现出四分五裂的态势。奉行亲美政策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忌惮于与美国的盟友关系而不得不支持美国的方案。然而，中东地区是一个民族国家概念发育不充分的地区，国家认同始终弱于宗教和部落认同。从宗教心理层面看，绝大多数穆斯林民众仍认为耶路撒冷是伊斯兰世界的“共同圣地”，难以接受犹太国家对耶城法律地位的变更，在外部强国压力和内部宗教情感之间进退维谷。什叶派国家伊朗则坚决反对特朗普政府的决定，从宗教和道德高度对美国大加挞伐，借机增强自己在伊斯兰世界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土耳其则表示，若此行动继续进行，不惜断绝与以色列的外交关系予以抗议。伊斯兰世界在这一问题上的不同立场，使地区政治更趋“碎片化”。

最后，缩小了美国在巴以问题上的斡旋余地。从历史看，美国始终谋求在中东和平进程中扮演斡旋人的角色，支持解决巴以问题的“两国方案”。自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来，特朗普是第一位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总统，颠覆了美国历届总统在该问题上的立场，进而可能让美国致力于斡旋巴以和平的努力毁于一旦。在美国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的首都后，巴以关系和巴美关系都降至冰点。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抨击特朗普是在“向犹太复国主义献礼”，称美国已远离和平调解人的角色。

评价及前景

特朗普关于耶城的决定，引发了一

系列的国际连锁反应，但都不足以让特朗普改变其诉求。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反对任何会危及巴以和平前景的单边措施，强调耶城的最终地位必须通过双方直接谈判来解决。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费代丽卡·莫盖里尼警告称，“耶路撒冷必须是两个国家的首都”，特朗普的行为恐使这个地区“倒退至更黑暗时期”。俄罗斯总统普京称，美国对耶路撒冷的承认适得其反且破坏地区的稳定。

在中东问题上，特朗普认为奥巴马时期的“战略收缩”导致美国与地区国家的关系变得隐晦、微妙，这种不清晰的关系增加了美国的交易成本。特朗普试图通过简单直接的手段让盟友、对手和敌人的关系都变得更明朗，以增大美国在中东的谋利空间。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虽然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将启动迁馆进程，但执行过程仍留有余地。一是白宫并未公布美国新使馆的地址，是否位于东耶路撒冷仍是未知；二是因涉及安保问题，使馆从建造到搬迁将至少耗时数年。

综上，特朗普的中东政策具有较强的反建制派特征，其中东政策展现出了明显的单边主义和交易主义逻辑。特朗普信奉“美国优先”的战略方针，试图以“最小投入换取最大回报”，但其看似精明的政策却蕴含着不小的风险。在耶城问题上的决定既是一步“险棋”，又是一剂“猛药”，表明特朗普正在以自己的方式重塑中东力量版图，既注重短期现实利益的交易，又布局美以之间的长期战略安排。然而，迁馆进程如何设计和落实，如何统筹巴以问题、伊核问题和叙利亚问题，都是特朗普政府面临的现实挑战。

热点透析

战略视角

（上接1版）

同时，我们也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环境污染治理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之间的矛盾依然突出，优质生态产品供给能力难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需要，生态环境保护任重而道远。因而，必须坚决打好污染防治的攻坚战，坚持走绿色技术创新型、环境资源节约型、清洁生产型、生态保护型、循环经济型的经济发展之路，注重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共进，实现经济社会目标与环境保护的内在统一和相互促进。

着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点任务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牢固树立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推动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为保护生态环境作出我们这代人的努力。报告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生态文明建设进行了全面部署，明确了总体设计、组织领导、路线图、时间表和落实的着力点。

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我们在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的同时也累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这些问题已经成为制约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实现的短板。贯彻新发展理念，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尤其突出的位置，补好生态文明建设的短板，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是我们必须遵循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需要贯彻落实6项重点任务：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绿色发展、创新发展；以解决大气、水、土壤污染

等突出问题为重点，加大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生态修复；全面促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倡导推广绿色消费；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切实加强组织领导，落实领导干部任期生态文明建设责任制，保障生态环境保护落到实处。

加快改革生态环境监管体制，促进自然资源产权统一管理、生态环境有效监管和国土空间有序管控治理大格局的初步形成。设立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管理和自然生态监管机构，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统一行使全民所有自然资源资产所有者职责，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统一行使监管城乡各类污染排放和行政执法职责。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

国土空间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载体。我国国土空间多样、陆海兼备，各地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不一。构建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完善主体功能区配套政策，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可以前瞻性地谋划我国未来在国土空间的分布，并与有限水资源、耕地以及其他资源相协调，实现区域开发的高效集约，从源头上改变先破坏后治理的老路，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坚决制止和惩处破坏生态环境行为”的提出表明了党对于生态文明建设的立场、态度和决心。这一措施有利于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化、法治化水平，有利于生态文明建设的高效长效机制的完善，有利于营造生态环境保护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哲学教研室）